**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編號：**

| 參賽類別 | ■小說組　　□散文組　　□新詩組 |
| --- | --- |
| 作品名稱 | 星期天屋頂有舞 |

阿嬤是在我回家的第三天，宣布她要穿高跟鞋的。

那時她正在剝毛豆。豆莢在她指甲底下裂開，啵的一聲，綠得發亮的豆子滾進不鏽鋼盆裡，叮一聲，咚一聲，像午後有人在很遠的地方輕輕敲門。客廳的電扇慢慢搖頭，把豆莢青澀的草腥味吹過來，又吹過去。我坐在旁邊假裝回公司的訊息，手機螢幕其實停在消磨時間的無聊小遊戲。她忽然說：「棠仔，你明天陪我去買鞋。」

「買什麼鞋？」

「有跟的。不要像你那雙，好像隨時準備逃難。」

我低頭看自己的球鞋。右腳鞋帶確實斷了，打了兩個結，結頭磨得起毛，鞋面的白早就褪成一種洗不乾淨的灰，像一張淋過雨又曬乾的紙。

「妳膝蓋不是會痛？」

「會痛也要穿好看。」她把一顆不飽滿的豆子挑出去，「不然痛得很冤枉。」

我當時沒有笑。後來想起來，很後悔沒有立刻笑給她看。

*

我跟家裡說，回來是因為公司讓我遠端工作。實際上，公司已經不需要我了。

那天是星期五。人資約我進小會議室，講了十五分鐘。冷氣開得很強，桌上那盒面紙從頭到尾沒人碰，最上面那張抽出一半，在出風口底下微微發抖。出來時，同事們都很忙，鍵盤聲像一場下得很均勻的雨。

最後一份要印的，是交接清單。印表機吐紙吐到一半卡住了，我蹲下去拉開側蓋，指尖碰到滾筒，是燙的。主管剛好走過來，等我把紙抽出來。紙皺了一角，我的名字被碳粉拖出一道灰。

他說：「辛苦了。」

我下意識地回他：「不會。」

說完我自己愣了一下，彷彿被裁掉是一件值得客氣的小事，像有人在電梯裡順手替我按了樓層。他點點頭，走了。印表機還在嗡嗡地暖機，吐出一股碳粉燒熱的味道，有點像焦糖，又有點像鐵鏽。綠燈一閃一閃，好似在等下一個人。

我二十六歲，拖著一只輪子很吵的行李箱，回到南部老家。從車站走回去的路上，輪子喀啦喀啦碾過騎樓高低不平的磁磚，碾過檳榔汁乾掉的暗紅斑點，碾過機車排氣管底下一灘一灘的熱，我一路都覺得，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麼。母親問我要住幾天，我說看案子。阿嬤倒沒有問，她把曬好的被褥抱進我的房間，拍了兩下，說這床棉被有太陽的焦味。我聞到的其實是樟腦丸，悶在衣櫃裡很多年的那種，但我說對。

她住在市場旁邊的平頂老樓，四層，沒有電梯。樓下以前是她的裁縫店，招牌龜裂了，紅漆被太陽曬成淡淡的豬肝色，上面還寫著清清楚楚的「玉蓮修改衣服」。字太多，客人都喊蓮仔店。收店以後，隔壁賣豆花的借去放桌椅。鐵門上還留著一小塊發黃的膠帶，貼過她的價目表：換拉鍊，改褲腳，衣服放大。「衣服縮小」是後來補上去的。她說這世界胖的人比較多，可是瘦下來的人也會回來，不能只替一邊做生意。

*

隔天下午，我陪她去鞋店。

鞋店裡有一股新皮革和橡膠混在一起的味道，悶悶的，有點嗆。店員捧出三雙黑鞋，鞋底厚得像饅頭。阿嬤說不要。店員又捧出一雙米色的，說很好走，很多阿姨都買。阿嬤看也沒看，指向櫥窗裡一雙酒紅色的鞋，鞋跟不高，側面一條細細的扣帶，被午後的光照著，像一小口還沒喝完的葡萄酒，在杯底輕輕晃。

「那雙。」

「那是跳舞鞋喔。」

「不然妳以為我要去爬山？」

她的腳背長著淡褐色的斑。套上鞋時，腳趾在裡頭找了一會兒位置，像幾個人搬進一間新房子，總要先吵一下才肯睡。我蹲著替她扣帶子，她伸手扶住我的肩膀，忽然很輕地問：「是不是很紅？」

「很紅。」

「你阿公一定會嫌。」

阿公過世六年了。我正要接一句他不會，她已經笑起來。

「他嫌歸嫌，錢還是會給我啦。」

她從包包最裡層摸出手帕包，一層一層打開，鈔票數了兩遍，連發票都對折收好。我想替她付，她把我的手撥開：「我自己的鞋，自己出。」

回程她沒有把鞋收回盒子，直接穿著走。走到麵攤前，她累了，我們坐下吃乾麵。大鍋翻滾著騰騰白煙，老闆將麵條俐落一振，淋上豬油與肉燥，繼而灑落蔥花。那香氣宛如一隻惡魔之手，自碗底悄然攀爬而上，蠻橫地將人的魂魄攫取而出。等待的同時，阿嬤從包裡拿出一張折過好幾次的紙攤開，摺痕都起了毛。上面是手畫的腳步，有左腳，有右腳，旁邊註記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最後那個「四」寫得歪歪的，像寫到一半被人叫走。

「誰畫的？」

「阿正。」

我抬頭。

「修電器的那個阿正？」

「市場有第二個阿正嗎？」

有，一攤賣魚的也叫阿正。但我沒有提醒她。

修電器的阿正伯七十六歲，頭髮很白，常穿一件口袋多得不得了的背心。他年輕時修收音機，後來修電風扇，再後來也收電鍋，店裡堆的東西，看起來都比他有希望活到一百歲。阿嬤跟他認識很久了。我小時候他來修冰箱，順手替我把電動腳踏車的馬達焊好，沒收錢，只說以後騎車不要騎這麼快。

「你們要去哪裡跳？」

「屋頂。」

「我們的屋頂？」

她低頭拌麵，嘴巴像在嫌我笨，眼睛卻躲開了一下，躲到老闆正在燙的那把青菜上。

*

老樓的屋頂，我好多年沒上去了。

星期三傍晚，阿嬤說要收床單，我跟著爬樓梯。樓梯又窄又陡，磨石子階梯被踩出一個個淺淺的凹，扶手的漆剝落了，摸起來粗粗的，帶一點鐵鏽的涼。阿嬤爬兩層就停一下，扶著欄杆，假裝在看牆上的水漬。我也停下來陪她看。那塊水漬像一隻沒有尾巴的狗，看了很多年，還是沒長出尾巴。

鐵門推開，風先灌進來。

是那種夏末的薰風，薄薄的、溫溫的，挾著好幾種味道一同起來：市場收攤的魚腥味，鱗片和碎冰在水溝邊慢慢融化；遠處誰家在烤雞，油滴進炭火裡，滋的一聲。樓下的鐵捲門一扇一扇拉下來，嘩啦，嘩啦，有人喊明天要不要叫貨，有人拿水管沖地，水聲混著收音機裡斷斷續續的新聞播報。整條街像一個準備睡覺的人，翻身翻得很吵。

水塔旁邊那盆九重葛居然還活著。紅色的花苞薄得像紙，風一吹就沙沙地抖，夾在亂七八糟的枯枝和綠葉之間，一副根本不需要我關心的樣子。

阿正伯已經在上面了。

他拿著一臺藍色的小音箱，見我來，先把音樂關掉。我認得那首歌，阿公以前喝完酒會哼，歌詞常常忘，只剩尾音拖得特別長，長到像是捨不得放下什麼。

「蓮仔，妳床單呢？」

「今天沒有洗。」

她答得太坦然，我反而不知道要怎麼質問。

阿正伯說，他女兒下星期要接他去北部住，這裡的店也要清了。他講得很平常，像在通知我們星期一瓦斯行休息。只是店裡那麼多螺絲，不知道該怎麼帶。

「帶幾顆就好啊。」阿嬤說。

「哪幾顆？」

她想了想：「這也是問題。」

他們坐在兩張塑膠椅上，認真煩惱起螺絲來。夕陽從水塔後面斜斜照過來，把兩個人的影子拉得好長，長到在磁磚上碰在一起，像兩個比他們本人更早認識的人。我站在旁

邊，覺得自己闖進了一部已經演了很久、而我從來不知道的電影。

他們年輕時就認識。那時她在成衣廠車衣服，他替工廠修馬達。有一年尾牙，他邀她跳舞，她說不會，明年再跳。隔年她結婚了，他也離開鎮上去外地工作。這件事在我聽來，很適合寫成一段長長的遺憾，阿嬤卻說：「後來忙成那樣，焦頭爛額的，誰還有力氣記得。」

她替人改過上千條褲子，生了兩個女兒，照顧公婆，也曾經半夜抱著發燒的我，一條街一條街去敲診所的門。阿正伯的太太也走了幾年，她生前很會養蘭花，店門口那座鐵架就是他親手焊的。兩個人是這幾年散步又碰上的，先聊菜價，再聊失眠，最後不知怎麼的，就聊到了跳舞。

「她說還欠我一次。」阿正伯說。

「我說的是試看看。」阿嬤糾正他，「欠字太重。」

他們開始練。只有幾步：往前，往旁邊，再回來。阿正伯的膝蓋彎不下去，動作像在替誰讓路；阿嬤老是搶拍，鞋跟敲在地上叩叩響，急著把下一步先踩出來，像一個怕趕不上公車的人。

兩個人不停地道歉。踩人的道歉，被踩的也道歉。我看得笑出聲，阿嬤回頭瞪我，瞪完自己也笑了。

「棠仔，你不要只站著。幫我們算。」

我替他們喊一二三四，喊到一半才發現節拍根本不對。阿正伯說沒關係，重來，我們就重來。伴隨著九重葛的枝條磨著水塔、發出一點沙沙聲；樓下豆花店用力拖著椅子、發出沉悶的喀啦聲。天色漸漸地一層一層暗下去，先是橘，再是灰紫，最後市場的燈一盞一盞亮起來。從屋頂往下看，像有人把一盒火柴輕輕撒在地上，每一根都還捨不得熄。

那天傍晚，我第一次沒有查看手機上的求職通知。

*

回到樓下，我有點興奮，跟母親說星期天想辦一場餞行舞會，讓阿嬤跟阿正伯好好跳完一首，再道別。

母親正在剁蒜。刀聲本來很規律，篤，篤，篤，像她這個人。聽到我的話，刀停住了。

「屋頂那麼多東西，跌一下怎麼辦？」

「把東西搬開就好啊。」

「你說搬開就搬開？你阿嬤洗澡滑了一下，是誰帶她去看的？晚上腳抽筋，是誰起來的？」

「我又沒有說妳沒照顧。」

「你回來才幾天就要辦舞會。我平常叫她走慢一點，她還嫌我囉嗦。」

刀又落下去。蒜末飛出來一點，沾在她手背上。她沒有擦。

我原本準備好的那些話——什麼年紀不該限制自由，什麼人活著就要盡情創造回憶——全像一口老痰卡在喉嚨，吞不下去，也吐不出來。冰箱門上貼著一張月曆，紅筆圈了好幾個日子，旁邊寫著小小的字：骨科、回診、領藥、量血壓。字跡是母親的，有一格寫錯了，用立可白塗掉，又在上面重寫。她每天早上六點起來，陪阿嬤去市場，再騎車去店裡幫忙到傍晚，回來煮飯。她的生活裡沒有娛樂，連電視都只是開著當背景聲。我明明知道這些，卻還是覺得她不懂。

那天夜裡，我被一陣很低的呻吟聲吵醒。

是阿嬤的房間。我光著腳走過去，門開著一條縫。床頭那盞小燈亮著，昏黃的，像一顆快要熟透的柿子。阿嬤側躺著，小腿抽筋，腳趾翹得緊緊的。母親已經坐在床邊了，把阿嬤的腳掌抵在自己肚子上，一手往上扳，一手順著小腿慢慢揉。

「放鬆，放鬆，吸氣。」

她的聲音很平，平得像一條走過幾千遍的路。

過了一陣子，阿嬤的呼吸慢下來，睡著了。母親沒有馬上起身。她還是坐著，手停在阿嬤的小腿上，頭一點一點往下垂，又猛地抬起來，像在跟睡意拔河。燈光照著她的側臉，我看見她鬢角有一撮白髮，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長出來的。她身上穿的還是白天那件 T 恤，領口洗得鬆垮，背後印著某一年社區運動會的字樣，早就褪得看不清了。

我站在門外，不敢出聲，也不敢走開。原來她白天剁下的每一刀，都是從這樣的夜裡一點一點磨出來的。那些疲倦不是一天積起來的，它們像河底的沙，一年一年沉下去，沉到最後連她自己都忘了，河水原本可以清得見底。有多少個這樣的晚上，我在臺北的租屋處睡得很熟，手機調成靜音，以為家裡的一切都會自己好好的。

後來她起身，替阿嬤把被子拉好，關燈。我趕緊退回房間躺下，聽見她的拖鞋聲經過我門口，停了一下，又走遠。

隔天早上我故意早起，母親已經在廚房了。瓦斯爐上溫著稀飯，她站在流理臺前切醬瓜，背影跟平常一模一樣，好像昨晚什麼事都沒發生。

我說我去買豆漿。她說家裡有，我說我想喝冰的。

我在巷口買了兩杯冰豆漿，一杯微糖，一杯無糖。母親喝無糖的，這件事我是排隊時才突然想起來的。想起來的那一刻有點高興，又有點難過——原來我一直記得，只是很久沒有用上。

回到家，我把無糖的那杯放在她手邊。她看了一眼，說太冰了，對胃不好。然後拿起來，插上吸管，一口一口喝完了。

我本來想跟她說些什麼。謝謝，或者辛苦了。可是一想到印表機旁邊那句辛苦了，就覺得這三個字太輕，輕到可以在任何地方、對任何人說。我什麼也沒說，只把她切好的醬瓜端上桌。

*

隔天我去問住二樓的屋主福叔。他聽說要在屋頂跳舞，先看我，又看樓梯，最後說可以，靠中間就好，別往牆邊擠，人也不要太多。

我找來表弟，搬走三張很有年紀的木頭桌子、一座少了一扇門的大紅衣櫃，還有一個不知從哪裡來的青色浴缸。阿嬤坐在屋頂的椅子上指揮，說那盆草不要丟，春天會開花。表弟問春天是哪一天，她說到了就知道。

衣櫃最底層有一個餅乾鐵盒，鏽得打不太開。表弟撬了半天才打開，裡面是一捲褪色的布尺、一把鏽了一半的大剪刀，還有滿滿一盒鈕扣。大的小的，貝殼的、牛角的、塑膠的，全混在一起，像一整個年代的眼睛都擠在裡面眨眼。

阿嬤接過去，手指在鈕扣裡撥了撥，撥出一顆深咖啡色的。

「這是你阿公西裝上的。」她說，「第二顆，常常掉。我縫了不知道幾次，最後乾脆拆下來換一顆新的，這顆就收著。」

「為什麼常常掉？」

「他吃太飽。」

表弟笑出聲。阿嬤也不禁莞爾，並把那顆鈕扣放進口袋，其他的連盒子交給我，說拿下樓，以後有用。我問什麼時候有用，她說衣服掉扣子的時候。這個回答跟春天一樣，到了就知道。

搬完的屋頂空出一大片，風可以從這頭直直吹到那頭，什麼都不必繞。

我還為此做了一張海報。

這是我以前的工作。我選了阿嬤最喜歡的緋色當底，畫了兩個圓圓胖胖的可愛小人，把鞋子塗成緋紅。標題是「最後的天台舞會」，副標寫著：七十歲的青春，也可以發光。做好之後，我很非常滿意，甚至想把它放進作品集。那天睡前，我把海報貼上社群，寫說請大家帶著祝福來，陪兩位長者完成一場遲來的浪漫。

我沒有問阿嬤。

她的手機還是按鍵式的，平常只拿來打給我母親，或問豆花店明天有沒有開。我太容易把「她不看網路」，誤認成「她不需要知道」。

*

星期六早上，豆花店老闆娘拿著手機上樓，笑著說蓮姨變名人了。我在房裡聽見她們言笑晏晏的對話，還以為事情正往好的方向走。

接著，門被推開了。

阿嬤拿著那張列印出來的海報，站在門口。她沒有罵人，只把紙丟在我桌上，問：「什麼最後？」

「就是阿正伯要搬走，所以——」

「他搬去北部，又不是搬去天上。」

我說那只是一個標題。她指著下面那行字。

「什麼叫遲來？我以前日子過得不好嗎？」

她問得很小聲，尾音也有點顫抖。我突然記起阿公站在這個房間的門口，戴著老花眼鏡，替我修書包的拉鍊；記起阿嬤罵他湯裡鹽下太多，罵完又把飯添給他。那些年裡，我沒見過她跳舞。可是不能因為她沒有跳，就說她一直在等。

我打開手機。有人留言說好感人，有人說一定要拍影片，還有人標註攝影社的朋友，說這題材拿去比賽會得獎。一位以前合作過的攝影師私訊問能不能來拍，連要帶哪一顆鏡頭都想好了。

阿嬤把海報翻過來。紙背一片空白。

「我們的腳都已經不好了，你還找那麼多人來看。到時候踩錯了，別人是不是還要替我們拍手？」

我說大家都沒有惡意。說完就知道這句話一點用也沒有。

「我知道。」她說，「可是我會不好意思。」

她回房間，把紅鞋收進鞋盒，盒蓋蓋得非常嚴實，然後說，星期天不要跳了。

母親在廚房聽見了，沒有出來罵我。她甚至沒有看我。她繼續洗菜，水龍頭開得不大也不小，瀝瀝的水聲，比罵人還難受。

*

中午，阿正伯來找我。他手裡抱著那個鞋盒。

「她叫我拿去鞋店退。」他說，「我想，退了就沒有了。不如先放你房間？哪一天她要是想穿，比較好找。」

我接過鞋盒，比那天在鞋店抱著的時候重了一點。我以為他會怪我，他卻從背心口袋裡摸出兩顆嶄新的螺絲，攤在掌心，銀亮亮的，像兩尾剛上岸的小魚。

「昨天搬櫃子掉的，等一下拿給福仔。」

「阿正伯，你們是不是跳不成了？」

他坐在樓梯口的凳子上，慢慢把鞋穿好。那雙鞋很舊，左腳鞋尖磨白了一塊，右腳側邊也補過。

「她不想，就先不要啊。」

「可是你要搬走了。」

「我會回來。女兒說車站有人接應，不會坐錯。」

我坐在他下面兩階，才發現自己比他急得多。我多希望事情有一個漂亮的收尾：星期天下午五點，夕陽剛好燒得最濃，老人剛好有空，賓客剛好到齊，而我也剛好……不再是那個失業、又什麼都搞砸的人。

阿正伯從口袋裡掏出一顆薄荷糖，糖紙扭不開，遞給我。他看著我拆好，說：「你最近很閒喔？」

我笑了一下，眼神落到旁邊。

「也算閒吧。賦閒的閒。」

他把糖放進嘴裡，點點頭。我正等他說一些人生大道理，他卻說：「那等一下要不要幫我搬電風扇？重的我自己搬不動。」

*

他的店裡有七臺電風扇。三臺待修，兩臺修好了，客人一直沒來拿，剩下兩臺是他自己的。我把風扇一臺一臺搬到門口，拿濕布擦葉片。灰塵化成黑水，順著我的手腕往下流，流進袖口，涼涼的。阿正伯打電話通知客人。有一位電話打不通，他試了兩次，最後把那臺風扇留在架上。

「也許人家還會來。」

我問那要放到什麼時候。

他看著風扇，好像也沒想好，說就先放著吧。

店裡很暗，只有門口那一方光，光裡浮著細細的灰，慢慢翻身，像一群睡不著的螢火蟲。空氣是機油、焊錫和舊紙箱混出來的味道，沉沉的，底下藏著一絲甜。牆上掛滿一圈一圈的電線，像晾著的麵線；架上的收音機、電鍋、吹風機排排站，每一臺都缺了點什麼，一顆旋鈕，一片蓋子，一截插頭，安安靜靜地等著被人想起。最上層擺著一臺木殼的老電唱機，玻璃罩積了厚厚一層灰，灰底下的木紋還隱隱透著光，像一張閉著眼睛的臉。我問那個也要修嗎，他說那臺不修了，修好了也沒有唱片。

「以前工廠尾牙，就是用這種。」他說，「那時候是我修好的。前一天還不會轉，我修到半夜。」

他坐在矮凳上，一邊撬風扇的後蓋，一邊講。講得很零碎，常停下來找螺絲，找到了才接下去。

那年尾牙辦在工廠的倉庫。布匹推到牆邊，堆得比人還高，空出中間一塊水泥地。天花板吊著一排日光燈，有一支壞了，一直在閃。廠長喝了酒，說今年大家辛苦，要放音樂。電唱機一轉，整個倉庫的人都靜了一下，好像不太相信那樣的聲音，會從這麼破舊的地方流出來。

「她那天穿一件自己做的洋裝。」阿正伯說，「用工廠剩下的布拼的。袖子跟身體不是同一塊，顏色差一點點，要很仔細才看得出來。」

「什麼顏色？」

「藍的。像下雨前的天。」

他說她那時候十八歲。那天很多人在跳，跳得亂七八糟，有人踩到別人的腳，有人笑到蹲下去。她坐在角落一張板凳上，兩隻腳縮在凳子底下，縮得好緊，像怕被誰看見。他走過去，問她要不要跳。

「她說不會。」阿正伯撬開了後蓋，裡頭的灰撲出來，他偏頭躲了一下，「我說我也不會。她說，那明年，明年再跳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然後就沒有明年啦。」他吹了吹馬達上的灰，「隔年她嫁人，我去外地。日子就這樣走過去，走得比電風扇轉得還快。」

他說這些的時候，臉上沒什麼表情，好像在講一臺很久以前修過的收音機，記得它的型號，記得它哪裡壞，至於它後來被誰帶走，已經不太重要了。

「你那時候會難過嗎？」

他想了想，把一顆螺絲咬在嘴邊，含糊地說：「會吧。可是她過得好，我也過得好。兩個人都好好的，就不算虧。」

我低頭擦扇葉，一片，又一片。擦乾淨的葉片在光裡透出一點淡淡的藍。我想像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坐在布匹堆旁，日光燈在她頭頂一閃一閃，音樂從破舊的電唱機裡流出來，流過她的裙角，流向別人。她錯過的那一首歌，後來被誰跳完了呢？還是就那樣一直懸在倉庫的半空中，像一粒不肯落地的灰塵，等了五十幾年。

*

到了下午，我把海報刪了。寫了一段說明，告訴想來的人，這場活動取消。也私訊那位攝影師，請他不要來。寫完我又檢查一次，把所有像在表演道歉的句子都刪掉，刪到最後只剩一句：是我沒有事先問過當事人，考慮不周詳。

阿嬤在廚房煎魚。油一直跳，我站得有點遠，說對不起。

她拿鍋蓋擋了一下，沒有回答。

「我把海報拿掉了。也跟大家說不要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妳想跳再跳。沒有想也沒關係。」

魚翻面，皮黏在鍋底，破了一大片。她皺眉，說這鍋子真的要換了。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原諒。但吃飯的時候，她把最大的那塊魚肉夾進我碗裡，叫我去拿筷子。

那天夜裡，我起來喝水，經過阿嬤的房間。門縫底下透出一線光，有熨斗的蒸氣聲，嘶——停一下，再嘶一聲。空氣裡飄著布料被燙熱的味道，暖暖的，帶一點漿過的香。我站了一下，沒有敲門，端著水杯回房間。那個鞋盒還擺在我的書桌上，盒蓋蓋得好好的。我把它往桌子中間推了推，怕它掉下去。

*

星期天從一早就陰陰的。

我很早起床，陪母親去市場。天是灰的，市場卻很鮮豔：紅的辣椒，紫的茄子，綠得快要滴下來的空心菜，一攤挨著一攤，像誰把顏料盒打翻在鐵架上。她在菜攤前挑番茄，每一顆都要翻過來看底部。我想起她三十幾歲時，常常讓我坐在機車前面去買菜，我的安全帽太大，一煞車就往前滑，擋住眼睛。現在她得把袋子拿遠一點，才看得清上面的價錢。

我替她提袋子。走到肉攤前，她忽然說：「你是不是沒有工作了？」

我看著豬肉上那層彷彿濕亮的淚光，說對。

「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「還不知道，履歷投了好幾家。」

她沒有說她早就看出來了，也沒有問我怎麼不講。她問我存的錢夠不夠，我說還有一些。她點點頭，買了半斤絞肉，跟老闆說不要太肥。離開肉攤，她才說：「不知道也要吃飯。」

回到家，她揉了三十幾顆小丸子，燒一鍋清湯。我幫忙摘菜，挑出幾片被蟲咬過的葉子。她拿回去，又翻過來看一遍，說洞不大，還可以吃。

鍋裡的水開了，她一顆一顆下丸子。我問她還會不會擔心阿嬤在屋頂跳舞，她說當然會，接著叫我下午把樓梯擦乾。我說天還沒下雨，她說有時候水是拖地留下來的。我看著她拿起鍋蓋，又放下，等湯面的浮沫撈乾淨了才蓋上。我那時才慢慢明白，她願不願意讓阿嬤跳，和她會不會繼續擔心，是兩件可以同時發生的事。

母親從櫃子裡拿出幾個杯子，叫我洗。都是家裡用了很久的彩繪玻璃杯，杯口有一點霧。我拿菜瓜布刷了兩次，還是那樣，就問她能不能用。她說能，別人是來喝水，又不是來檢查。我把杯子擺好，聽見阿嬤在房裡翻衣櫃，偶爾一件衣服被丟到床上。過了一會兒，房間裡傳來她喊我的聲音。

床上攤著一件黛藍色的洋裝。領子有點大，腰間的褶子燙得筆直，一道一道，像剛犁過的田埂。阿嬤站在鏡子前，拿洋裝貼在身上比。

「這件會不會太正式？」

我手裡還拿著杯子。

「妳要去哪裡？」

「去樓上。」

我一時不敢高興。

「就我們幾個？」

她想了一下：「豆花店那個可以叫。她上次請我吃芋圓。」

我轉身要走，她又叫住我，指了指我的房間。

「那個盒子，拿過來。」

原來她知道。我沒問她怎麼知道的，她也沒說。

*

於是我去叫豆花店老闆娘。她本來穿拖鞋，聽完，回去換了一雙乾淨的布鞋，端上來一桶還溫溫的芋圓湯，芋圓擠在糖水裡，紫的、黃的、橘的，像一鍋不肯安分的彈珠。福叔說他不懂跳舞，負責顧門就好。表弟坐在樓梯間打遊戲，被母親喊來搬椅子，嘴裡抱怨，動作倒很快。

只有五個客人。加上阿嬤跟阿正伯，一共七個人，誰都沒有帶攝影機。

阿正伯穿一件白襯衫，袖子燙出很直的線，頭髮也梳過了，看得見梳齒留下的細痕。他把小音箱放在椅子上。阿嬤還沒上來，他先自己走了一遍腳步，走到第四步，自己笑了一下，重來。

雲壓得很低，一層疊著一層，像一床吸飽了水氣的舊棉被，沉甸甸地覆在城市上空，誰也不敢去掀。是那種要下雨、又還沒下的天色。空氣黏黏的，貼在手臂上，帶著鐵皮屋頂曬過又冷下來的氣味。遠處的高樓只剩灰灰的輪廓，連鴿子都飛得很低。九重葛在風裡輕輕晃，紅花一抖一抖，是整片灰裡唯一敢大聲說話的顏色。

阿嬤上來的時候，先扶著母親的手。那抹深藍在昏暗的樓梯間裡顯得有點沉，可是一跨過鐵門、踏上屋頂，裙襬倏地就亮了——像有人把一整片傍晚的海輕輕抖開，披在她身上，海面上還浮著細細碎碎的光。紅鞋也一步一步跟著踩進灰白的天光裡。她戴了耳環，很小的一對純金耳環，是阿公以前買的。

母親把一張椅子放到他們旁邊，說累了就坐。聲音還是平常那個聲音，有點急，好像怕她來不及聽。

第一首音樂放下去。阿正伯伸出手，阿嬤就把手搭上去。

他們跳得不好。

我很想替這件事留一點面子，可是真的不好。第二步兩個人往同一邊躲，第四步阿正伯停住，阿嬤多跨了一下，笑著撞到他的肩膀。豆花店老闆娘本來要鼓掌，手抬起來又放下，改去舀芋圓。風把母親的髮夾吹歪了，她伸手壓住，眼睛一直沒有離開他們。

可是我看著看著，竟覺得那些踩錯的步子，也是舞的一部分。五十幾年前沒有跳的那一首，大概本來就不會跳得多好；它只是一直在那裡，在倉庫閃爍的日光燈底下，在一雙縮起來的腳旁邊，安安靜靜地等，等到兩個人都老了，膝蓋都不靈光了，才終於被輕輕地、笨拙地踩響。

跳到一半，阿嬤說等一下。

大家都站直了。阿正伯也鬆開手。

「鞋帶太緊。」

她坐下來，我蹲下去替她重扣，放鬆了一格。她低頭看著我，忽然說：「你小時候穿鞋都把腳縮起來，難穿得要死。」

我說沒有，她說有。我們爭了一會兒，誰都不肯認輸。我抬頭的時候，看見阿正伯站在一旁，嘴角動了一下，像想起什麼，又什麼都沒說。我也想起來了——倉庫裡的板凳，板凳底下那雙縮得緊緊的腳。原來那個動作，不是我發明的。

母親走過來，蹲在我旁邊，替阿嬤把另一隻鞋也鬆開。她的膝蓋碰到我的膝蓋，兩個人擠在一起，有點狼狽。阿嬤看著我們，說：「好，現在一人孝順一隻，不要吵。」

第二次，他們只跳了半首就坐下了。阿正伯出了汗，額頭亮亮的。阿嬤接過母親遞來

的水，喝得太急，嗆了一下，自己拍拍胸口。她笑著說這件裙子腰做得太緊了，以前的自己實在太苛刻。我把音箱關小，讓他們說話。

沒有誰哭。

福叔從口袋裡掏出一顆剛從抽屜翻到的電池，問阿正伯這種還能不能用。表弟已經吃到第三碗芋圓湯，母親叫他留一點給別人。大家的對話把屋頂填得滿滿的，連那張沒有人坐的椅子都顯得忙碌。

*

雨落下來的時候，阿嬤正在教我跳舞。

她嫌我肩膀太硬，說我像在搬貨。我說這幾天本來就在搬貨。她握著我的手，慢慢把我帶到旁邊，一、二，再回來。她的掌心有一層薄薄的繭，手指關節粗粗的，是幾十年握剪刀、捏針線磨出來的。小時候，她就是用這隻手，一把抓住快要衝到馬路上的我。

教了兩輪，她放開我，朝母親招手。

「換妳。」

母親正在收杯子，說她不要，她不會。

「我也不會啊。」阿嬤說，「不會才要學。」

母親把杯子放下，在褲子上擦了擦手，走過來。她的步子比我還硬，像在走一條結了冰的路。阿嬤牽著她往前，往旁邊，再回來。第三步母親踩到阿嬤的腳，嚇了一跳，連說對不起。阿嬤說沒關係，被踩的也要說對不起，這是規矩。母親愣了一下，笑出來。我好久沒看她這樣笑了，笑到要用手背遮嘴，好像那個笑是偷來的，怕被誰發現。

雨很小，先在橘紅色的磁磚上落出一個一個深色的圓點，像誰在地上悄悄蓋了許多小印章，證明這個下午確實來過。母親催著收東西，福叔推開鐵門，大家往樓梯走。阿正伯抱著音箱，豆花店老闆娘端著桶子，我扶著阿嬤，走在最後面。

到了門邊，她卻停下來，回頭看了屋頂一眼。

「還想跳？」我問。

「沒有。九重葛忘了搬進來。」

我把花盆拖到屋簷下避雨，再回來扶她下樓。淋過雨的酒紅色鞋子在樓梯上走得很慢，鞋面沾著細細的水珠，顏色暗了一層，像那杯葡萄酒又被斟深了一些。她每下一階，就把裙襬提起一點。母親在樓下喊，湯要涼了。她回說知道。喊完，她看我一眼，笑得有點不好意思，像一個玩太久、終於肯回家的孩子。

*

阿正伯搬走那天，我幫他把最後一個紙箱抬上車。箱子上寫著「工具」，裡頭有各式各樣的螺絲和工具，也有兩盆快要枯萎的小蘭花，用報紙包著，只露出葉尖。最後他還是決定，每一種螺絲都帶幾顆。

上車前，他把我叫到店門口。架上只剩那臺電話一直打不通的電風扇，扇葉被我擦得

發亮。

「這臺你幫我顧。」他說，「人家要是來拿，跟他說修好了，不用錢。」

「要是一直沒來呢？」

他想了想，拍拍風扇的鐵網，像拍一個孩子的頭。

「那就天氣熱的時候，拿去給你阿嬤吹。」

我說好。他又從背心口袋裡掏出一顆薄荷糖，這次糖紙是他自己先扭開了，才放進我手心。

他女兒謝了我好幾次，又拿了一條毛巾，要讓阿正伯墊在腰後。他不肯，嫌熱。阿嬤站在騎樓下，遞給他一袋滷好的毛豆。

「到了打電話。」她說。

「好。」

「不要用講的，真的要打。」

他又說好。

車子轉過街角，她沒有馬上上樓，走去隔壁買豆花，還挑剔今天的花生比較硬。

買完豆花，她提著塑膠袋走回騎樓，在阿正伯平常坐的那張藤椅旁停下來。她拍了拍空著的椅墊，像在拍掉一層根本不存在的灰，然後慢慢坐下去。那個位置正好在風口。風從街角繞回來，還帶著車子剛開走時的熱氣，混著排氣管淡淡的焦味，暖暖地撲在她臉上，像是臨走前回頭呵的一口氣。它在騎樓下打了個轉，掀掀她的衣角，翻翻藤椅上的舊坐墊，又碰了碰那袋還溫著的豆花，然後一點一點涼下去，散了。她把豆花擱在膝頭，看著對面那堵空出來的牆——剛才那輛車就停在那裡——一口一口，吃得極慢。

紙碗見底了，她還捏著湯匙，望著對街那棵老榕樹。榕樹的氣根垂下來，在風裡輕輕地擺，像許多條說不出口、也不必說出口的話。她就那樣靜靜地欣賞著，好像要把這條看了一甲子、熟得不能再熟的街，從頭到尾重新再看一遍。看完了她才撐著膝蓋，有些遲疑地扶著扶手站起來，慢慢走回屋裡。

*

兩個星期後，我收到一間小公司的面試通知。工作跟以前有點不一樣，薪水也少一些，在臺北。我打開電腦，把舊作品集從頭翻到尾，沒有放進那張被刪掉的海報。

面試是視訊的，我背後是阿嬤曬過太陽的那床棉被。面試官問我為什麼離開上一份工作，我說被裁員了。說完，我等著那種熟悉的、想道歉的感覺湧上來，結果沒有。它只是一件發生過的事，像一臺修好了、還沒有人來拿的電風扇。

又過了一個星期，對方打電話來，說錄取了，下個月一號報到。

我請他們讓我考慮幾天。

掛了電話，我在床邊坐了很久。窗外市場又在收攤，鐵捲門嘩啦嘩啦地拉下來。我想去，也想留。想去的那個我說，總不能一直賦閒下去；想留的那個我說，你才剛學會怎麼

替一個人鬆開鞋帶。

阿嬤敲門，問我是不是要去臺北了。

我說還在想。

她「哦」了一聲，沒有多問，把我留在客廳的手機拿進來，說阿正想用那種可以看到人的電話，叫我教她。

我教了四次。第五次接通的時候，她對著螢幕，一開始只露出半張臉，一截額頭和一隻眼睛。

阿正伯那邊是一扇窗，窗外晾著兩條毛巾。他說住得還習慣，附近也有市場，只是攤販不認得他，買青菜都沒有送蔥。

阿嬤很不服氣，說那怎麼行。

他問紅鞋有沒有收好。她抬起腳，湊得離鏡頭太近，他笑著說看不清楚。她索性把鞋脫下來，捧到胸前，讓他慢慢看。

我坐在旁邊，筆電開著，正在寫給那間公司的回信。寫了一句「感謝貴公司的肯定」，刪掉；寫了一句「經過慎重考慮」，又刪掉。游標在空白的地方一閃一閃，像那天印表機上的綠燈，也在等我。

電話那頭突然響起那首歌，很小聲。阿正伯說他按錯了，手忙腳亂地找按鍵。阿嬤叫他不用關，又問他哪一天回來。

我起身，把門帶上，去廚房燒水。

走到一半，聽見她在房裡替他數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、二。

第三拍她笑了，第四拍就沒有接上。

我扶著廚房的門框，也跟著停了一下。那一步本來就畫得歪歪的。就像她把十八歲的約定一路耽擱到老，中間改了上千條褲子，放長的、收短的、放寬的、改窄的，日子卻從來沒有真正歪掉過。

水壺在身後輕輕地鳴響起來。我站在漸漸暗下來的走廊裡，聽著屋裡那段剛剛好的空白。